

洞商与羊楼洞区域社会

李灵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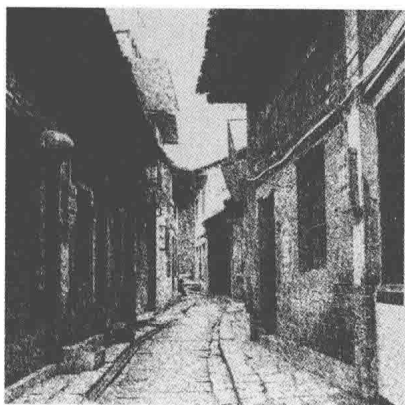
W H S

學術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洞商与羊楼洞区域社会

李灵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洞商与羊楼洞区域社会 / 李灵玢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161 - 8136 - 2

I. ①洞… II. ①李… III. ①茶叶—商业史—
研究—赤壁市 IV. ①F326.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985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获湖北省重点学科（中国史学科）资助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缘起	(1)
第二节 目标与区域	(3)
第三节 材料与方法	(7)
第四节 解构与重构	(13)
 第一章 前洞商时期：早期茶政与洞茶	(16)
第一节 茶乡羊楼洞	(16)
第二节 洞区贡茶	(22)
第三节 茶税与榷茶	(23)
 第二章 洞商家族研究	(30)
第一节 洞商家族的形成	(30)
一 开基创业	(31)
二 分家析产	(33)
三 三种家庭形式	(37)
四 继承	(42)
第二节 经济—文化资本的转化	(49)
一 富润屋：物化的经济资本	(49)

二 业儒的情结：对文化资本的追求	(54)
三 乡绅：有身份的人	(60)
第三节 宗族的权力	(65)
一 礼治与法治	(66)
二 地方权力的争夺	(72)
三 扩展地方自治权	(74)
四 饶氏：宗族的历史构建	(77)
五 雷氏：历史构建与现实构建	(88)
六 宗族优势的较力	(96)

第三章 洞茶场域研究

(100)

第一节 洞茶场域中的行动者	(101)
一 洞商	(101)
二 晋商	(123)
三 俄商及其买办	(131)
四 英商及其买办	(137)
第二节 洞茶场域中位置分布与力量竞争	(141)
一 晋商与洞茶场域的建立	(142)
二 早期洞茶场域中的洞商	(151)
三 中期洞茶场域中力量位置的变化	(154)
四 英俄汉口竞买与洞商的发展	(161)
第三节 洞茶场域中资本力量的变迁	(168)
一 资本竞争与英商退出	(168)
二 俄商垄断与羊楼洞包茶庄	(171)
三 晋商在茶叶场域中位置的下降	(179)
四 俄商退出与洞茶业的嬗变	(181)

第四章 洞商与羊楼洞茶叶社会	(185)
第一节 社会阶层	(185)
第二节 商业组织	(190)
第三节 新兴行业	(194)
第四节 社会治安	(200)
第五节 社会慈善	(202)
第六节 社会教育	(205)
第七节 社会风气	(207)
第八节 茶业改良及其社会效应	(212)
结 语	(216)
参考文献	(222)
后 记	(235)

绪 论

第一节 缘起

2012年初春的一天，笔者进入羊楼洞进行田野调查。

今天的羊楼洞，主体制茶业已经迁出，收购茶货的主要业务也早已停办，当年进驻过无数茶庄的巨大行屋已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山连村司令官带领的骑兵以马拉火烧毁去大半，仅剩的一条石板街，以及街两边密集排列的曾经是各色店铺的门面屋，都已经褪去了往时的繁华与喧嚣，在四面青山的陪伴下静静地延伸伫立，在我回荡的足音中仿佛悄悄诉说着曾经的财富神话。

行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我心中常常会升起一种异样的、不真实的感觉。在我心中，羊楼洞真是一个很不宜成为商业中心的小镇，它僻处鄂南山中，交通甚不便利，距最近的水道也有好几公里，而且即使在水满时节也只能通行吃水较浅的小船；居民人数不多，且田多为山地，原本毫无政治影响；就属于茶产地这一点而言，它与周遭几十里当中的许多小镇并无二致。茶业为清朝晚期我国最大项涉外贸易，每年数千万两白银的海量交易，难道历史真会选中羊楼洞这样一个并不起眼的山间小镇作为茶市和茶业的中心吗？

然而脚下默默延伸的石板街，以及石板上隐约可见的车轮辗出的沟槽，都在清晰地告诉我，这一切都曾真实地发生过。当年这条石板街上，数百辆结队而行的独轮车曾各自满载数百斤茶货匆匆辗过；在这个小镇上，当年确实曾经人头攒动，每当茶季，往来的商贩、行人摩肩接踵，等待出卖毛茶的茶农和茶贩排起的队伍沿街迤迤。酒馆和小食店的叫卖声、

茶烟馆和妓楼中小曲的吟唱声、牙行和当铺中传出为示公允而故意拉长喊出的评级声、运茶的独轮车队车轴和车轮发出的咿呀声、铁匠铺喘息的风箱和打铁时发出的叮当声，曾汇成愉快而喧闹的巨大声流。熟食铺、酱园、糟行和菜市发出的各种气味，撩拨着人们的味蕾和神经；行人各色服饰、匹头行扯出的新到布样，不同店铺悬挂的商帘、牌匾五光十色，巨大的财富就曾在这声色的海洋中无声地流动。这些情景的真实性，我已经无数次在图书馆那些厚厚的书籍中读到，又曾在省档案馆那些蒙有灰尘的卷宗中验证。

于是，一些疑问都在这似真似幻的时刻浮上我的心头：历史在什么样的时刻曾给了此地以什么样的机缘，使这个长不过千米的街道和几里见方的小镇勃然兴盛，以至于在西方并不记载蒲圻县的地图上，羊楼洞这一个小镇地名竟赫然以醒目的形式出现？羊楼洞的茶业是如何产生、发展、鼎盛，又是如何走向衰亡？考察中一直存在于我心中的疑问，也逐渐凝结成最初撰写本书的动因——写一部最为真实地反映羊楼洞茶业兴衰的洞镇茶业史。

为了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我一次次进入羊楼洞和与之有关的赵李桥、羊楼司、新店，逐一细看茶砖厂每一个车间，踏勘新店河中用麻条石砌成的旧水码头，徜徉在回子街曲折的深巷中。我进入仅存不多的已改成民居的茶行老屋，询问老屋变迁的历史，探访他们家中的旧时族谱，去看他们珍藏的半块俄商制作的红茶茶砖；我约谈耆老，听他们讲述小镇的旧事和民间传说；我到羊楼洞饶氏家族的谱局做客，倾听饶氏老人叙述饶家故事以及家谱编纂的曲折艰辛；我上松峰山，进入茶园，踏访当年因修水库而平掉的旧坟和砌入大坝水口的墓碑；我找到文化站，去阅读拍摄那些民间编写的故事和读本，访寻那半篇残留的泉记；我在刚过年关的寒风冷雨中伫立在赤壁市小巷街口，借着昏黄的路灯等待当地冯姓民俗专家回家，想起程门立雪的故事，于是祈祷自己的“冯门立雨”也能获得了解茶乡口碑和掌故的回报。在寻访资料的过程中，村镇的居民也向我诉说他们自己的心事。我总难忘记，伴旗山雷氏老人和他的亲人们托我反映他们的茶山被开发商占用而延付报偿问题时，那无比期盼的目光；北山村黄氏老人为了订正他心目中的一个小字，专赴省城约我带他下阅马场、上黄鹤楼核查碑志，我忘不了当他如愿以偿时，那满意的眼神。我也忘不了羊楼洞那

一个叫雷敢的青年向我诉说他外出打工而染病的经历；赵李桥茶厂刘氏老门卫向我诉说承包茶厂的浙江籍商人不顾员工利益和生产需要竭泽而渔的行径。他们的淡然和激愤都让我心有触动。

“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是人们有目的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结果。”^① 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萧凤霞（Helen Siu）曾说过的这句话，不知从何时起越来越清晰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回旋。我渐渐地更想了解，当年这些人的祖先，他们曾为着什么样的目的行动着？羊楼洞本地的绅商和外来的客商都做了些什么，使得每年数千万斤茶货从这里陆续运出，而数百万两白银的利润就在这个并不起眼的山中小镇落地？我从文献中已然了解到，先有晋商，后有代表英国商人的粤赣商人，以及俄罗斯商人曾来到这里，促进了羊楼洞茶业的发展和兴盛，而现在我更想了解，羊楼洞本地的人是怎样由被动或主动的应付，到积极地进取开拓，接纳各方有利因素、消解不利因素，使羊楼洞一方的商贸茶业做大？往昔那些反映茶业兴衰的数字曾经让我激动不已，而现在让我更感兴趣的，似乎已变成造就羊楼洞经济并在这些数字背后忙碌活动着的人们。我在与导师谈过数次之后，这一想法逐渐明晰，经过导师指导，我将本书书名由《近代湖北羊楼洞茶业研究》改为《洞商与羊楼洞区域社会》；研究重点由茶业改为茶商，中心由茶业改为人；本书也由地方经济史的研究转入区域社会史探索的领域。

第二节 目标与区域

笔者把本书的主要目标定在发掘羊楼洞这个特定区域社会在近代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恰如萧凤霞所说，曾“塑造了特定的社会语境，人类主体在其中发现自我，全情投入”^②。这里所说的“特定的社会语境”，就是羊楼洞茶叶社会的商业语境；而所谓“人类主体”，则主要是指羊楼洞本地茶商即洞商，以及与之产生和成长有重要关系的山西茶商即晋商，作为英商代理进入羊楼洞的粤赣茶商，再有就是俄国茶商及其买办。

“洞商”这一概念是笔者对羊楼洞本地商人群体的概括称谓。在羊楼

^① 萧凤霞：《跨越时空：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130期。

^② 同上。

洞业茶之初，与晋商合作经商的羊楼洞本地商人在地方文献中还仅仅被称为“洞人”，例如叶瑞廷的《菰蒲随笔》：“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于邑西乡芙蓉山，洞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这是因为在晋商到来之前，最初与其合作代为收购茶货的这些羊楼洞本地人还不具备商人的身份。所以最初“洞商”的诞生，是晋商到来并大力培植的结果。最初时期的“洞商”，其主要经营方式为“坐贾”，即利用高大行屋作为与外来晋商合作的投资，坐地赚取属于自己的一小部分业茶利润。经过与晋商等外来商人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合作，羊楼洞地方的商人群体逐渐成长起来。特别是在他们主动引进以输英红茶为背景的粤赣商人之后，羊楼洞本地商人逐渐脱离了单纯对于晋商的依靠，许多本地商人走出去，走广东，到汉口，赴上海，直接与洋商交易，凭借同光时期茶贸的蓬勃兴盛获得了极大发展，但这时地方文献对他们的称呼却还只是“本帮商人”“本帮商团”或“行帮商人”，而并没有“洞商”这个名号。例如1883年汉口六帮茶商联合抵制西方买主，1886年六帮茶商议定公砵规章，六帮之中都有所谓“本帮”茶商。他们自称为“本帮”“行（háng）帮”，这些称呼是相对于“晋商”“徽商”“闽商”等外来客商的“外帮”“客帮”而言的。这一时期羊楼洞成为输洋茶叶的收购和产制中心，大批本地商人投入茶业，本帮茶庄从无到有，由少渐多，洞商成长壮大，出现了每茶季出入巨额资金的超级大茶商。这些茶商已经不限于经营茶叶，还在雄厚资本的基础之上开办当铺和钱庄，并在上海、汉口、湘潭及湖北各地开设钱庄和茶庄分点，在广东的羊楼洞茶商雷立南等甚至作为湖北商人的领袖在广州主持重建湖北会馆。羊楼洞商人集团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湖北商人第一帮。“洞商”这个名称其实是站在第三方研究者的角度对羊楼洞茶商集团做的一个概括，它就相当于传统地方文献中所说的“本帮”商人。

羊楼洞社会在近代的变迁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羊楼洞本地很早就有经商传统，当地也很早就有茶叶的生产和商品茶的输出，但是如上文所述，在晋商到来之前它的巨大产业潜力并未苏醒，它的商业模式并未建立。在晋商与羊楼洞本地商人联手开拓之后，才又有了红茶与代表英商利益的粤商的进入，而羊楼洞本地商人也借此机遇直接出外经营。英商的退出与俄商以汉口为基地进行的垄断先后发生，导致茶贸利权外移，羊

楼洞本地茶商因日益边缘化而生存艰难。所谓羊楼洞商贸茶业实际上是洞商与多方密切联系并分阶段共同推动的综合商业体系。对内，它与晋商、粤商等关系紧密；对外，它与俄商、英商及西北边贸联系密切。中国鄂南数县以羊楼洞为中心的一小片地区的农业、手工业产出及羊楼洞商人追逐财富的活动，却联系着几乎整个世界的商业、经济和政治。

这就关涉到前面提及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所谓“区域”问题。

从本书标题所标明的文字看，本书所谓的区域，应该就是作为茶叶产地的羊楼洞及其周边地区，但是实际上，本书所研究的羊楼洞从来就不是地图上固定的一个地名、一个地点，它从一开始就是超越地方的。由于羊楼洞直接参与国际商贸商品茶叶的出产、集散和制作，它的兴盛和衰微直接与国际商贸形势相关联；羊楼洞出产的茶叶经由洞商与雁行的晋商合作而辗转运出，羊楼洞商人走广东、下汉口、赴上海经商，他们足迹所到之处即是区域的延伸。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许多时候，不弄清彼地的历史情形就无法了解和阐述羊楼洞茶业和茶商的状况和行为。例如晋商“大盛魁”在蒙古地区的活动就促成了包括羊楼洞在内的产茶基地的开辟和成长；太平军发动的战争及晋商在福建下梅村经营的失败，就与晋商在咸丰年间大规模进入羊楼洞一事息息相关；了解晋商的行为特点及其漫长商路，才可以理解何以洞商在与晋商合作的阶段中主要采取“坐贾”的经营形式；了解汉口开埠的背景，我们才可以了解同光时期羊楼洞茶业何以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印度、斯里兰卡茶园的开辟如何导致汉口俄商独大和羊楼洞包茶庄的大量产生以及洞商利润日益微薄化，等等。这些主客体的不断互动使得本书所谓区域的主体羊楼洞常常显得变化无常、漂移不定，使得它从一开始就是“超越地方”甚至超越国境的。在这方面，笔者遵循科大卫、萧凤霞、黄国信等关于区域的观点：“正是人类学家参与观察的方法给我们一个重要提示，他们研究区域，研究的是区域中活动的人，这些人往往居住在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很小的地理空间之内，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常常超越其居住空间，他们要与外界进行经济交换，他们与外界有亲朋往来，他们甚至要去外面的世界求学、考试、经商等，人类学‘深描’当地人生活状况的研究，当然不可能对研究对象的这些活动视而不见。这说明，对于人类学来说，区域只能是研究对象也就是人的区域，随着人的流动，区域也是流动的，区域的边界并非僵硬的地理界线。历史人

类学吸取了人类学关于区域的此种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区域研究是跟随着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流动和作为研究者问题意识之流动而进行的研究。……根据问题意识的不同，区域的内涵可以小到一个村落，大至整个世界。沿着这种思考方向，我们认为，区域是在不同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人群因应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具与多层次的观念。……区域与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各种要素（如地理、市场、语言、风俗、族群）及与之相应的主观认知息息相关，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多层次、多向度、动态而弹性的指涉。……区域研究就不应该是先划定地理范围，再作茧自缚的研究类型。从某种角度上看，真正区域研究的取向应该是反过来的，即首先要追问我们何以认为这样的划定是合理的？这样的划定关系着怎样的历史建构过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达致对地方性传统与王朝观念、制度互动过程的深入了解。”^① 笔者认为，我们也许还可以对此作更为通俗的理解：把上述区域的变动不居甚至国际影响到地区的这些变动视为舞台背景的转换，在布景不断变换的羊楼洞舞台上，只要表演的主角永远是洞商及与之相关的人，这也就确定了本书所谓区域的辩证所在——“region is seen as a conscious historical construct”（区域被视为一种有意识的历史建构）^②。

解释这一点，有助于说明本书在以时间的顺序发展建立纵向坐标，以探索解答以上主要问题作为主线的时候，何以用一系列子问题的文化解析和深入探索建立横向和相对平面的研究体系。这些子问题如：羊楼洞的自然与历史条件有何独特之处？主导北方边贸与外贸的晋商为何以及何时、如何选中羊楼洞作为其主要产茶基地？羊楼洞本地商人采取何种方式与晋商合作？他们自己曾有什么样的商业传统？他们与晋商合作的主要产品老青茶砖如何制作及发展？羊楼洞本地商人自身在主要与晋商合作的阶段有何使晋商看中并长期留驻的经商特点？为何坐贾方式是洞商在与晋商合作时期的主要经商形式？他们的商业组织、商业文化和主要盈利模式是什么？英商的主要代理粤商何时及为何到达羊楼洞？红茶的进入及竞卖对于

^① 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研究》2006年第5期。

^② Helen Siu, David Faure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扎根乡土》),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

汉口开埠有什么影响？而汉口的开埠又对于羊楼洞的茶业有何影响？红茶的经营对洞商由坐贾转为行商的经营行为有什么影响？汉口成为茶贸中心以及俄商一方独大对于羊楼洞茶业有什么影响？地方政府对此如何认识并采取了什么措施，而羊楼洞本地茶商又如何应对？羊楼洞茶业的发展对于羊楼洞当地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什么影响？盛极一时的羊楼洞茶贸为何以及如何式微、衰亡的？

这些问题的提出和阐释的尝试，使研究的结构既有一个纵向的中心线索——洞镇茶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又将这一线索置于广阔的历史视野背景之下，以洞商为中心，努力叙述出洞镇当地以及与外来各方面的各种社会关系。因此，本书的叙述有时会涉及晋商在蒙古边地的经营，有时会细琐到羊楼洞制茶工艺的改进，有时会涉及鸦片战争之后的通商开埠及太平天国军兴，以及汉口外商买办及茶工厂等的运营。

第三节 材料与方法

笔者注意到国内外已经有了一些有关的研究成果。

国内对于中国近代茶叶的研究大致兴起于民国时期，例如刘选民的《中俄早期贸易考》（《燕京学报》第二十五期单行本，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福建省政府统计室1943年版），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时主要是一些资料梳理的基础工作和考释文章，如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自20世纪80年代，茶叶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陈祖槲、朱自振《中国茶叶资料选集》（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渠绍森《山西外贸志》（《山西地方史志资料丛刊》，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行，1984年），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谢天祯《有关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兴衰的统计资料》（《福建茶叶》1984年第4期），张正明《清代茶叶商路》（《光明日报》1985年3月6日），吴仁安、唐力行《明清徽州茶商论述》（《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

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安徽省博物馆编纂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郭蕴深《论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朱成国《试论“恰克图条约”对中俄贸易的影响》(《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庄国土《18世纪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吴孟雪《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陈椽《中国茶叶外销史》(碧山岩出版社1993年版),陶德臣《外销茶运输路线考略》(《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萧致治、徐方平《中英早期茶叶贸易》(《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张海鹏等《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陶德臣《近代中国外销茶流通环节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周晓光、李琳琦《徽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李希曾的《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甘满堂《以茶制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张正明《清代晋商的对俄茶叶贸易》(《农业考古》1997年第4期),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王国健的《论五口通商后徽州茶商贸易重心的转移》(《安徽史学》1998年第3期),周晓光《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的衰落》(《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邓九刚《茶叶之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商的经营状况》[《近代中国》(第十辑)2000年],周晓光《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穆雯瑛的《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丁言模《左儒右贾——安徽帮》(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李三谋、张卫《晚清晋商与茶文化》(《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庄国土《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刘建生《晋商研究》(山西人

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 高春平《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晋阳学刊》2002 年第 4 期), 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年版), 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 年第 6 期), 刘建生、吴丽敏《试析清代晋帮茶商经营方式、利润和绩效》(《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袁欣《1868—1936 年中国茶叶贸易衰弱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刘建生《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 秦宗财《明清徽商与茶叶市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7 期], 王璐《明清晋商对俄茶叶贸易行为的经济分析》(《中国流通经济》2010 年第 1 期), 等等。这些研究, 比较集中在明清及近代有关我国茶叶的生产、销售状况, 晋商、徽商等从事茶贸的主要商帮, 与茶叶贸易有关的国际关系, 运输茶叶的主要茶路的考察, 以及与茶有关的文化研究。

国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如 [俄] 特鲁谢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 (19 世纪前)》(1882 年), [日]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张正明、阎守诚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美]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中国茶叶研究社 1949 年版), [美]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俄]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 (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俄]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俄] 西林《俄中贸易关系——十八世纪的恰克图》(伊尔库茨克 1847 年版), [美] 艾梅霞《茶叶之路》(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 霍赫洛夫的论文《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1978 年第 18 期), [日] 吉田金一《关于俄清贸易》(《东洋学报》卷 45 第 4 号), 等等。研究视角有些不同, 而内容与国内研究也大致相近。

关于洞茶和羊楼洞茶区方面的研究已经有若干可资借鉴的成果, 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华中师范大学为赵李桥茶厂编写的厂史《洞茶今昔》(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对洞茶和茶区发展历程进行了简单追溯; 万献初等人《鄂南茶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在狭义的民俗文化层面介绍与洞茶有关民俗和文学艺术表现形式; 华中师范大学定光平的硕士学位论文《羊楼洞茶区近代乡村工业化与社会经济变迁》(2004 年), 着

重研究羊楼洞茶区近代乡村工业化经济的发展，附带涉及当地社会变化。其他有关的研究，大多比较偏向于农业、经济、商帮和茶路，例如陈均的《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皮明庥等《武汉近代经济史料》（武汉地方志编纂办印行，1981年），[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杜七红《论茶叶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复旦大学张珊珊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以主要出口商品为中心》（2007年），都仅在有关部分连带述及羊楼洞的茶产。周美娟《晚清晋商与湖北茶业的发展》（《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等主要以晋、粤、英、俄茶商为主要研究对象，只是附带涉及羊楼洞茶商。武汉理工大学李百浩教授的研究项目《茶叶之路（湖北段）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2010年），则更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专门对湖北段茶路沿线的城镇、村落、民居、茶坊、茶行、茶馆、茶庄、茶厂、会馆、驿站、宗教建筑等展开系统研究。而关于茶商的研究，目前则主要集中于中国几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等）和外商（英、俄商人）及其买办对中国茶叶市场的开拓与经营上。比如傅衣凌先生1947年《明代徽商考》对“徽商”的研究，1967年日本学者重田德利用民国《婺源县志》对婺源茶商进行的分析，以及上述论著对于晋商、徽商茶叶经营所进行的细致探讨，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等对于中俄茶叶贸易的概述，等等。这些成果颇丰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同时也使我意识到，需要专门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近代羊楼洞茶叶社会进行尽可能深入的认识，而这样一种深入，更需要借重历史人类学的方法。

在材料的搜集方面，我不但通过考察档案、正史、方志等积累了大量属于传统历史学的文献资料，并尽可能全面地阅读了已经正式出版的各种有关图书，更注意采用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收集口述史料、族谱、碑刻、诗文集、竹枝词、民间读本、民歌、民间仪式、民间信仰等民间文献资料。我这样做的方法论依据，主要由历史人类学所提供。这样做对于本书所述及的主体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洞商是一个长期以来未被重视的地方性特殊商人群体，田野资料非常适合这类社会群体，由于田野资料眼光向下，我们可以通过田野资料倾听普通百姓对于这段历史的诠释